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

罗平汉

[摘要]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由此启动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年,是新中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间,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但不必“回归”,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当今的社会现象和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 社会主义;改造;评价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2)12-0046-06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由此启动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原来具有私有制性质的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即将多种所有制改造成为单一的公有制。由于当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于是有人发出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亦有人提出应当“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就此作一探讨。

一、如何评估社会主义改造对 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对于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学术界存在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两种对立

的观点。肯定方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的变革,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所以它是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而且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尔后的一切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基础。^①否定方则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根本不是搞早还是搞晚了、搞快还是搞慢了、形式多样还是简单划一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搞、要不要搞的问题,是有没有积极意义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推广包产到户,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证明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根本错误的。

要评价社会主义改造的是非得失,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几年,确实是新中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民经济发展比较

作者: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参见沙健孙:《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再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年第1期。

好的时间。就全国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而言,当年与上一年比较,1950年增长17.3%,1952年增长32.2%,1953年增长28.3%,1954年增长25.1%,1955年增长2.91%。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力与私营企业相比,1951年超过18%,1952年超过52%,1953年超过73%,1954年超过87%,1955年超过100%。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全国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1955年增加32%,1957年又比1956年增长8%;公私合营商业零售额1956年比1955年增加15%。^{[1](p.302)}

就农业而言,虽然增长的速度没有工业迅速,但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57年全国农业总产值536.7亿元(1957年不变价格),比1952年的417亿元增长24.8%,平均每年递增4.5%。占农业总产值80%以上的农作物产值从1952年的346.6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432.6亿元,增长24.8%,平均每年递增4.5%。1957年粮食总产量19505万吨,比1952年的16392万吨增长19%,平均每年递增3.5%。其中稻谷总产量8678万吨,比1952年的6843万吨增长26.8%;小麦总产量2364万吨,比1952年的1813万吨增长30.4%。棉花总产量164万吨,比1952年的130.4万吨增长25.8%。糖料总产量1189.3万吨,比1952年的759万吨增长56.6%。茶叶总产量11.2万吨,比1952年的8.2万吨增长36.6%。烤烟总产量25.6万吨,比1952年的22.2万吨增长15.3%。水果总产量324.7万吨,比1952年的244万吨增长32.9%。与此同时,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增长较慢或有所下降的是油料、黄红麻和蚕丝。油料总产量419.6万吨,仅比1952年419万吨增长0.1%。黄红麻总产量30.1万吨,比1952年下降1.6%。蚕茧总产量11.2万吨,比1952年下降8.9%。^[2]

一般说来,与大规模的所有制变动相伴的,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动荡与经济的一时衰退。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没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下降和经济的滑坡,而且中

国经济在这一时间段还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还有一定的提高,这是今天评价社会主义改造时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重要事实。当然,这几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战乱不断,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国家从长期的战争状态转入了和平建设阶段,这种国内和平环境应当说是近代以来少有的,这就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新中国的建立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人民对于执政党和新政权充满期待,也确实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国家建设和各项工作之中;“一五”期间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开工建设,有力地加强了我国的工业基础,也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等等。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生产效率较合营前有了很大提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55年之前合营的,主要是那些生产条件较好、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主要是对中小企业进行改造,这期间全国共有7.07万户私营工业实现公私合营,职工总数为114万人,平均每个企业只有16人。这些企业中的多数不但规模小,有的甚至是前店后厂,而且设备陈旧,管理落后,生产效率低。公私合营后对这些企业实行合并改组,原则是“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有的是若干小厂合并成一个大厂,有的是将若干小的、落后的企业合并到大的、相对先进的企业去,至于各小厂一些过于陈旧落后的设备则干脆淘汰,购置相对先进的设备,建立比较规范的管理制度。采取这样的办法,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无疑比原来的私营小厂要高得多。同时,这几年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稳定农业税收、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增加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放数量、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总体上讲,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社会生产力水平没有下降,而且这些年间工农业生产还得到了发展。

但是,也应看到,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骤完成,因而在改造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在农村,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并在农业合作社内部建立了以“评工记分”为主要内容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理论上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但实际上评工记分不但手续烦琐,而且社员之间也往往由于抹不开情面而不能对每个人的劳动认真进行“评工”,所以许多农业社建立后往往在“记分”问题上记的是“大概工”,即固定工分。这样做固然简便易行,但却变成典型的平均主义,使得社员间干多干少、能力强弱都是得一样的工分,结果严重挫伤了那部分劳动积极、生产技能强的社员的积极性,以至于能干的也不干、能多干的也少干。一些地方针对这种情况,曾探索出了在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进行“包产到户”的做法,但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农村开展的两条道路大辩论中,却将“包产到户”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加以批判,而这种固定工分的做法在后来的人民公社时期被进一步强化,成为长期以来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没有认识到其实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在所有制问题上搞单一的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而可以在保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存在,这样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非公有制经济几乎不复存在,而按劳分配又变成了固定工分和固定工资,不但使经济发展缺乏活力,而且也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没有得到应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改善的重要原因。

二、如何看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方面,还是在文化制度方面,都与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是多种所有制共存,当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是如此。于是,一些人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意即早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搞多种所有制,那又何必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将多种所有制改造成为单一的公有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单一的公有制恢复为多种所有制共存,特别是当下大力发展的民营经济,实际上就是当年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复活”;在农村实行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基本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由集体生产恢复为个体生产。既然如此,似乎当年根本就没有必要对个体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的时间自然可以更长些,在改造的过程中也不必那样急骤,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完全没有必要搞单一的公有制。问题在于当年的人们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认识。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其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3](p.316)}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提纲时,特地加了这样一段解释性的话:“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

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4](p.702)} 1954年3月5日,吴玉章(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撰写了一篇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其中写道:“百战百胜的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我们指出:建成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的深刻的社会改造事业。要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一切困难,在劳动中竭尽我们创造性的才能,以便最后消灭一切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而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为中国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5]从这里不难看出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与认识。

在当时看来,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必须是公有制的,而且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社会主义也只能搞按劳分配,而不能有其他的分配形式,否则会出现不劳而获的剥削,剥削现象的存在将背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自由竞争会导致社会生产的无序与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其目的就在于使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多种所有制中的非公有制,改造为单一公有制,消灭剥削,实现按劳分配以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同时,还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由此形成。因此,对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个问题,其实应当是“早不知今日,才有当初”。也就是说,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时,人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应当允许搞多种所有制,应当允许多种分配方式,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更没有认识到即使通过所有制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之所以在农村实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城乡允许乃至鼓励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逐步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

义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深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们的认识总会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不能苛责前人,只能将有关人与事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才能对历史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客观的评价。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能否“回归”

有人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就是当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回归,只不过名称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罢了。亦有人主张中国发展到现在,已有许多现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法解答,而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可以对这些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人们将这种观点概括为“新民主主义回归论”。

例如,有人提出要“再举新民主主义的大旗”,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左中右都能认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宝贝”理论,既是本土的,又是国际的,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唯一路径——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而没有真正遵循的时候,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6]还有文章说:“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7]

的确,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无疑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如不论是当下还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

生活中都是居于领导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作为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都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形成的;在经济制度上也有许多类似甚至相一致的地方,如多种所有制共存,多种分配形式共存,都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等。但我们以为,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回归”或“复归”。

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但在所有制结构上仍有明显的差异。以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前的1952年为例,各种所有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占19.1%,合作社经济占1.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个体经济占71.8%。^{[8](p.87)}即就是说,当时在各种所有制中,占主体地位的既不是国营经济,也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个体经济(其中主要是个体农业)。这些年来,虽然国有经济的比重在下降,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但从根本上讲,公有制仍占主体地位。

当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多地表现在作为农村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的公有性质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互助合作虽然开始产生并为党和政府所支持和鼓励,但直至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农村经济体制基本上仍是个体农民所有制,这不单体现在生产方式上是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对于土地具有所有权,以及附随所有权而产生的土地处置权。农业合作化其实就是将农民所有的土地和其他重要生产资料集体化、公有化。农业合作化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即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按照195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规定:在初级农业合作社阶段,对于社员交予合作社统一使用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在一定的期间还保留社员的所有权,并且给社员以适当的土地报酬。也就是说,此时农民对自己交予合作社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但具有

所有权,而且可根据入社土地的多少获得不等的收益,即土地分红。至于土地收益的多少由各个农业合作社自己决定,当时有地劳(即土地与劳动)五五、四六、三七分红等不同情况。这也是将初级农业合作社称之为半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是一种既能体现按劳分配又能体现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社员不但关心自己在集体劳动中所得工分的多少,而且也关心土地质量的提高、耕畜的保膘、大型农具的保管等,因为生产资料的好坏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联系。

初级社转入高级社后,社员的土地就公有化了,不但所有权归了合作社,而且取消了土地报酬。1956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高级社“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9](p.352)}同时,该章程又规定,合作社应抽出一定数量的土地分配给社员种植蔬菜,面积一般不超过当地人均土地数的5%,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社员自留地。自留地并不是社员入社时自己留下的土地,而是将所有的土地交给高级社后由社里给予其使用权的土地。至于自留地的所有权,当然属于高级社。于是,高级农业合作社就被认为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当时,公有制、按劳分配被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而高级社正好符合这两个要求。1958年高级农业合作社转变为人民公社后,原农业合作社的土地所有权就转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了。本来,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可以适当分离的,农业合作社建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可以获得使用权,仍可以个体生产的方式进行耕作,但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将土地分散给农民个人耕种,实际上就是分田单干,就会出现两极分化,所以长期以来对包产到户采取高压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绝大多数的地方将集体的土地以家庭为单位分给农民个体经营,但农民只取得了土地的经营权(或者说使用权),在土地的

所有权上仍是集体的,农民与集体是一种土地承包关系。因此,农民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流转,但个人无权将所有权转让,不能进行土地的买卖。2002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所以,现阶段农民的富裕程度虽有不同,但农村不可能如同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那样出现一个新的富农阶层。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也成为当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所有制上的一个重大区别。

如果将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重新定性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那就意味着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由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都是不应当的,因而对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评价,根本不是搞早了、搞快了的问题,而是该不该搞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余年的历史就不好解释了,而且会由此引起重大的思想混乱。不但如此,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也并非都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可以解释和解决的,因为当下的国情与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十分清楚,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反倒能更好地解释当今的社会现象和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所以,在当下,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不动摇。

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其进行研究时,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社会主义改革,都具有

历史必然性,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否定。中国原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能直接走入社会主义,因而必须有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此作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采取措施转入社会主义。前文已经论及,基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只能是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这就使得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被僵化而缺乏应有的活力,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改革成为必然。随着改革的深化,人们对何为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也随之深化,于是得出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因此,当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当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回归”,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定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 [2]陈廷煌.1953—1957年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 [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5]吴玉章.中国人民沿着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N].人民日报,1954-03-05.
- [6]张木生: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J].南方人物周刊,2011,(37).
- [7]杜导正.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J].炎黄春秋,2009,(4).
- [8]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上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 [9]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美景

This paper appli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 materialism to discuss the pentad's basic connotations, developing train, relations and basic requirement and highlights the features of system, practice, theory and nation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overall pentad arrangement. (ZHU Bing-yuan Qiu Gen-fang)

On Carrying out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To carry out the Party's theoretical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requires careful study, faith and use. In study, it requires us to master theory text, use well learning resources and put it practice; in research, the new achievement should be used to explain new phenomena, new problems and raise theoretical coverage; in sharing experience, the ordinary stories shall reflect spiritual force and increase theoretical charisma; in effect, various methods shall be used to ensur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e carried out faithfully. (GAO Zu-lin)

Deng Xiaoping'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ientific Recognition and Upholding Guiding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ominate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Deng Xiaoping was dedicated to uphol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it. He opposed to vulgarizing it and was against the "two whatever" dogmatism, first proposing the grasp of scientific ideology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a complete and accurate way. He insisted on evaluating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Mao Zedong scientifically and summariz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of Mao Zedong Thought, which safeguarded the authority of it.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gave birth to Deng Xiaoping Theory, which acted as a connecting lin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and guaranteed the consistent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deology, providing driving force and spiritual motive power to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UYANG Xue-mei)

Several Questions on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194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hich indicated China entered th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In 1953, Mao Zedong raised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which started the large-scal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1956, after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China entered socialist society.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witnessed a sound development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the reas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manifold. There are many useful experiences we can draw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Society but we needn't "go back", we can better explain the present social phenomenon and solve the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with the theory on the initial stage of socialism. (LUO Pinghan)

Mao Zedong and the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Strategic Decision: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broke the hegemony on the nuclear and space technologies monopoly, which safeguarded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made China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Facts proved that military strength was one important factor in decid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speech right of big power. To further explore Mao Zedong's development on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strategic decisive ideology, we would get some useful enlightenment. (WANG Ji-yi)

Reasons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CP's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from 1936 to 1945: From 1936 to 1945, the CCP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has been developed greatly, which is mainly expressed by the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s and active feedbacks by other countries. The reason of this improvement lies in several aspec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the increasing of Chinese soft power and hard power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high-quality discourse officials have left better impress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high-profile topic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and conce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solid platform has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CCP and its remarks. The strengthening of CCP international power of discourse shows that in addition to a stro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we should also establish a well-qualified discourse staff from both home and abroad, design two kinds of topics and set up two domestic and overseas platforms. (HUANG San-sheng)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m: Countries, as the "visible hand", played